

光明书话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回归中国姓

段真子

2020年11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批文献被学界誉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最后的宝藏’”,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历经沧桑,终于与世人相见。12月20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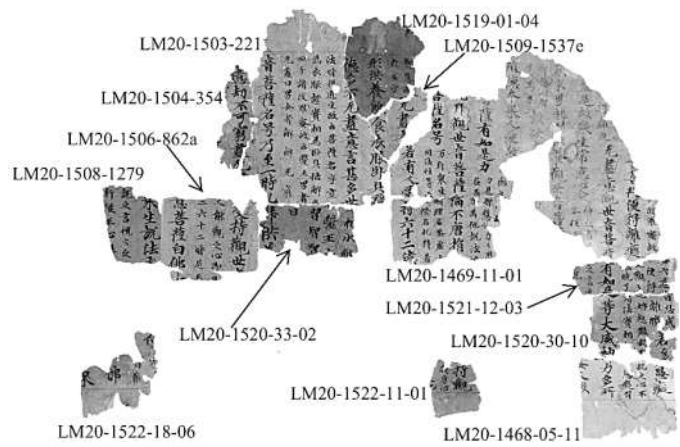
百年前,我们无法主导流散文书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旅博文献”的命名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旅博文献”总计26000片的文献残卷,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印证了古代丝绸之路,同时阐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图为首次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发现的唐代写本《古文尚书·商书·汤誓》。资料图片



图为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列子》,虽然只有2行,但内容与敦煌本不重合。资料图片



唐写本《观世音经》,用37件残片缀合而成,图中编码为其中13件。与敦煌本内容高度一致,但吐鲁番本有所省略。对于复原原典面貌以及进一步研究北宋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资料图片

1 从“大谷文书”到“旅博文书”

出土于新疆的汉文文献,何以入藏旅顺博物馆?这要从上世纪初开始追溯。

自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敦煌文献被发现并开始外流,开启了一段陈寅恪所说的“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等一批批“探险家”接踵而至,疯狂攫取中国的文物。新兴的东方国家日本也不甘落后。1902—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探险”,足迹涉及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劫掠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文物,统称为“大谷收集品”。其中,古文书一类称作“大谷文书”,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地区,少数来自新疆库车、和田等地的古代遗址、墓葬,还有一些来自敦煌。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

像走散的孩童一样,“大谷收集品”在远离故土、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第一批文物,分存于日本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1945年日本战败,这批卖出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2015年8月,整理团队赴旅顺博物馆查阅原件。资料图片

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朝鲜原德寿寺官石造殿。另一部分,分两批运抵旅顺,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住所。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1945年日本战败,这批卖出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2 不负国宝,走出“学术伤心史”

“旅博文书”为何时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

实际上,在《旅博文献》出版之前,“大谷收集品”中的文书整理、研究工作已开展近百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为主导,选择性公布文物图片、目录为主要形式。如,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橘瑞隆刊印的《二乐丛书》(1912—1913),介绍了少量净土、法华佛经残片。二乐庄被转卖后,“大谷收集品”四散,由香川默识整理的《西域考古图谱》(1915),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1937),也刊布了少量文物图片;关东厅博物馆等新入藏单位分别对所收文物进行编目,如附于《新西域记》后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等。然而,由于彼时中国深陷战事,无暇他顾,国内学人难得了解。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980年以后,可以视为第二阶段。遗留在日本的“大谷文书”,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其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一时间成为研究重镇。1983年,日本学者小田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出版,轰动吐鲁番学界。截至2009年第四卷出版,共刊布近万件文物的黑白照片及其原文。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一度引领了日本甚至是中国的研究潮流。国内学界紧跟的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争取超越。

然而,相比之下,“旅博文书”并未获得同等关注,只有与龙谷大学“大谷文书”相关者才能进入学界视野。直到1992年,中国学者王珍仁、刘广堂、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一文发表于《新疆文物》,首次对部分文书内容进行释读,整理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开端。“旅博文书”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走出深闺。

200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旅顺博物馆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2006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出版,展示了部分佛经残片的图版、名称,发布了相关研究。2007年,《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出版,介绍了馆藏文书的来源、特色和价值。但“旅博文书”数量庞大,仅汉文文献就多达26000余件,有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一千年内所写的各类文献,除绝大部分为佛教典籍外,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写经题记、经录、道经、四部典籍、法典、公私文书、数术文献、医药文献等,涉及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诸多方面。因此,以上工作和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对“旅博文书”进行全面整理和深度揭示,十分必要。

3 百年旧貌换新颜

近年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全面整理“旅博文书”的条件已十分成熟。

2015年,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合作,开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五年来,先后近50人参与,为26000余件“旅博文书”确定题名,撰写题解,编制总目索引,最终汇于图版《旅博文献》。这一成果不仅是“旅博文书”首次全面公布,也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创造了新的标。

《旅博文献》全书35册,图版部分按“旅博文书”编号为序编排,尽量采用原大彩色影印,标注比例尺,图下注明编号题名,避免了以往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因黑白印制导致的清晰度不够、信息损失等问题。文字部分,含题名和题解,解题内容包括文献译(作者)、电子佛典对应位置、校勘记、年代、参考文献等信息,附于每一册图版之后,并汇总、编制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使用。

这样完备的体例,等于为每一件“旅博文书”建立起相对详细的学术坐标;而想要完成26000多个坐标,并非易事。

首先,要攻克两大难关,给文书准确定名。“按图索骥”是定名的基本办法,即对照残片所存文字,找到其文献出处。然而一方面,“旅博文书”时间跨度上至西晋,下至北宋,且多为写本,字体形态多,文字识读难度大。另一方面,文献契合难度大。仅以佛教文献为例,很多初传中国或流行一隅的佛教文献,或重译,或佚失,今日所见版本并不与残片内容完全匹配。还有一些残片内容,存在于多部佛典中,单凭检索文字无法确定唯一出处。想要攻克这两大难关,就需要整理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

其次,完善书法分期理论,给文书精准断代。由于“旅博文书”碎片化程度高,大多纪年信息缺失,即便明确出自某部典籍,也不能直接精确断代。因此,整理团队细致比对有纪年敦煌吐鲁番文献,提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实操性的书法分期理论,并据此解决了“旅博文书”的断代问题,呈现于每一条解中。

最后,建立一整套科学高效的工作制度,保证项目运行。每一条定名,每一段解在进入校稿环节前,至少经过六次质检。对于检索前人研究,更新参考文献、编制总目索引等重要环节,设立专人一贯负责制,避免数据混乱、脱节。从2017年5月到2020年9月30日,九人每人完成四次校稿,期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校对工作始终未被耽搁。

“旅博文书”是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海内外学术界对其整理和公布期待已久。因此,五年来,数十篇有关“旅博文书”中各类文献的学术论文,发表于多种期刊。这些文章围绕“旅博文书”而作,也同时推进着“旅博文书”的整理工作。26000余条定名、解题,虽寥寥几行,但无一不是反复斟酌的结晶。每篇参考文献背后,都代表着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这些文章的作者并不仅限于整理团队内部,也多有对某部典籍、某些问题研究多年的同行专家。“旅博文书”此次的完整公布,也昭示着中国人更开放的胸怀,期望众人拾柴,共同推动学术进步。

“旅博文书”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其风采理应让世人共睹。因此,公布26000余件“旅博文书”的原大彩图,尽可能展示其原貌,保留残片上每一道折皱,每一处残破,才能让世人铭记其经历的沧桑巨变,不负国宝。《旅博文献》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在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分进合流”的进程中,“旅博文书”必定扮演重要角色;进一步整理出版“旅博文书”录文本,并充分利用其丰富的信息内涵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提升“旅博文书”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地位,让中国学人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界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

读书者说

从民众生活世界探寻民族复兴的再生力

□ 华宇

《微历史》,是一个既有时尚意味又有学术含量的词汇,因为细节最能引发读者的兴趣,也最能反映学者探幽入微的功底。学者李长莉的新书《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一本探微知著、可浅可深的佳作。

《微历史》之“微”并非津津乐道于琐碎微观的小事。在作者看来,“微历史”有三重含义:作者强调“生活史”并非家长里短,而是去探索社会变革的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原委;“民众史”并非单纯的民间视角,而是探索民众观念与精英思想之间以及民众自治空间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微观史”也不是对个案的无限展开,而是探究一个事件与时代大变动的种种深入的勾连。可见,以小见大、倚史贻治,是本书的方法和关怀。

走进近代中国人立体多维的生活世界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青年人的婚恋观、家庭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书中第四章,作者从晚清民国畅销书这一视角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趣的解读。通过对出版史相关史料的梳理,作者发现,一些以男女感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明清时期自传体笔记,如冒襄《影梅庵忆语》、蒋坦《秋灯琐记》、沈复《浮生六记》等,在五四前后突然被书商重视,从不上台面的末流书籍一跃成为了青年们争相购买的畅销书,其中又以《浮生六记》最为典型。

沈复《浮生六记》成书于1808年前后,主要记述作者与妻子陈芸“布衣饭菜可乐终身”的日常生活,文字清新率直,充满了艺术的趣味。但沈复笔下以夫妻为中心的小家庭生活,虽然随性洒脱,却与当时主流的大家庭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陈芸在婚后因着男装与夫出游、谎称归宁与夫游太湖、与艺妓拜拜姐妹等原因,为公婆所不容,被两次逐出家门。其实,《浮生六记》中令后世无数青年羡慕的“小确幸”背后,是沈复与妻子陈芸的惨淡人生,具有时代性的悲剧色彩。

但《浮生六记》这本书却与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有所不同。沈复去世后,该书散落民间,无人问津。一个世纪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社会观念体系,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等成了新青年的口号,《浮生六记》也突然从地摊上的残篇冷籍一跃成为热门书,在文坛获得了无人不晓的知名度,陈芸这一女子形象则被传为经典、术文献、医药文献等,涉及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诸多方面。因此,以上工作和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对“旅博文书”进行全面整理和深度揭示,十分必要。

更重要的是,《浮生六记》经五四时期众多著名学者推介解读后,被彻底卷入时代的大潮:俞平伯认为沈复夫妇所表现的“个人才性的伸展”是对“男权”为中心的旧礼教的挑战,因此他把这部书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文字”,于1922年前后刊印,使该书在青年人中很快流行开来;在林语堂眼中,沈复夫妇“悠闲”的人生观背后,是儒家入世主义、道家自然主义以及儒道共通的乐生主义等西方人特有的人生哲学的体现,是治愈中国工业文明下人们疲于奔命、异化劳动的良药,当林语堂在1935年前后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后,该书在美国大受追捧,引发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共鸣;与俞、林等推崇的态度不同,潘光旦从优生学和生物进化的角度对《浮生六记》大加批判,他认为恋爱婚姻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两人的小天地,还应该“照顾到两人以外的世界”和“数十年生命以后的未来”乃至民族的长远发展,年轻人不可耽溺于私人的闲适浪漫,而应具备“种族竞争”的意识,“为种族计,为国家久计”。

可见,从被湮没到被迫再到被批判,《浮生六记》这本小书的史书,几乎可以反映近代中国人婚恋观、家庭观的变迁。在《微历史》的其他章节中,作者也遵循同样的思路,从民众生活世界的改变、星期制度的实行、城市夜生活的兴起、民间防疫措施的变革等一系列微观视角出发,一步步放大眼光,展现了一幅近代中国人立体多维的生活世界。

《微历史》通过对“生活”这一主题不同侧面的分析,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在西方列强倾销商品和清政府无力回应的情势下,生活领域最早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清政府面对民生领域这一变局却反应迟钝,丧失了政府及时主导社会转型的时机;第二,近代工商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社会基础,城乡生活差距加大则潜藏着社会冲突的根源;第三,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们为适应生活环境变化而改变生活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历史,生活观念的变化则是晚清民国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的杠杆与源泉;第四,民

在百姓的生活中发现中国历史

《微历史》通过对“生活”这一主题不同侧面的分析,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在西方列强倾销商品和清政府无力回应的情势下,生活领域最早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清政府面对民生领域这一变局却反应迟钝,丧失了政府及时主导社会转型的时机;第二,近代工商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社会基础,城乡生活差距加大则潜藏着社会冲突的根源;第三,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们为适应生活环境变化而改变生活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历史,生活观念的变化则是晚清民国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的杠杆与源泉;第四,民

众生活的变化及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国家制度改革的基础与动力。除了内容之外,在方法和理论层面,《微历史》还给我们许多启发。首先是结构上,《微历史》以“近代中国”为副标题,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专著在处理长时段研究对象时多以纵向专题(如政治、经济、文化)或纵向分期(如历史分期)等来划分结构,这样的方式不仅在政治史中占主导,在社会史中也屡见不鲜。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其特殊性,正如向哲生引阿格妮丝·赫勒所说,日常生活是自在的、重复的,生活史的精彩恰好在于它层次模糊,有着比政治和思想更复杂的实践,其关节处很难厘清就简,所以过于清晰的逻辑线和分类法反而容易淡化日常生活的精髓。《微历史》跳出了横(专题)纵(时间)的结构安排,全书分为城之生活、乡之生活、市之生活、家庭生活四个部分,各章节内容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常给读者以“思前向后”的阅读体验,其交叉恰是生活自身生发出来的日常逻辑,更好地呈现了“生活”这一主题的复杂面向。

其次是写法上。对于生活史研究,有学者曾指出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即生活史研究不够生活化,一些作品充满了学术化的概念和结构化的范式,缺乏故事性,题目令人眼前一亮,但读起来却味同嚼蜡。且不论这些现象有舍本逐末之嫌,单就论文气太重这一点来说,容易使历史研究丧失其引人入胜的叙事内核。《微历史》的可读性是很强的,作者在各个章节都适当穿插个案研究,如英国传教士周福州的经过、杨月楼案所引发的关于“良贱婚姻”的舆论战等等,这些案例引人入胜,给读者以历史小说阅读的体验;再如作者引用了大量文学性的史料,如京沪等地的竹枝词等,这种由民歌演化而来的诗体既契合生活史的主题同时也使该书的叙事更为生动活泼。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历史写作需要“文气”,在这一点上,《微历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李长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众生活的变化及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国家制度改革的基础与动力。除了内容之外,在方法和理论层面,《微历史》还给我们许多启发。

首先是结构上,《微历史》以“近代中国”为副标题,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专著在处理长时段研究对象时多以纵向专题(如政治、经济、文化)或纵向分期(如历史分期)等来划分结构,这样的方式不仅在政治史中占主导,在社会史中也屡见不鲜。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其特殊性,正如向哲生引阿格妮丝·赫勒所说,日常生活是自在的、重复的,生活史的精彩恰好在于它层次模糊,有着比政治和思想更复杂的实践,其关节处很难厘清就简,所以过于清晰的逻辑线和分类法反而容易淡化日常生活的精髓。《微历史》跳出了横(专题)纵(时间)的结构安排,全书分为城之生活、乡之生活、市之生活、家庭生活四个部分,各章节内容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常给读者以“思前向后”的阅读体验,其交叉恰是生活自身生发出来的日常逻辑,更好地呈现了“生活”这一主题的复杂面向。

其次是写法上。对于生活史研究,有学者曾指出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即生活史研究不够生活化,一些作品充满了学术化的概念和结构化的范式,缺乏故事性,题目令人眼前一亮,但读起来却味同嚼蜡。且不论这些现象有舍本逐末之嫌,单就论文气太重这一点来说,容易使历史研究丧失其引人入胜的叙事内核。《微历史》的可读性是很强的,作者在各个章节都适当穿插个案研究,如英国传教士周福州的经过、杨月楼案所引发的关于“良贱婚姻”的舆论战等等,这些案例引人入胜,给读者以历史小说阅读的体验;再如作者引用了大量文学性的史料,如京沪等地的竹枝词等,这种由民歌演化而来的诗体既契合生活史的主题同时也使该书的叙事更为生动活泼。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历史写作需要“文气”,在这一点上,《微历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最后是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研究往往侧重宏观层面以物质生产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论,对于微观层面日常生活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微历史》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微观层面的展开。此外,如何跳出“西方中心论”,真正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这一点上,本书的一些观点很具启发性。比如,通常认为,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东西方伦理,但作者却指出,中国近代家庭伦理的萌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实用的“民间伦理”的复活,这些伦理名不经传,却在野史杂史、小说戏曲中经百口耳相传,历久弥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巨变是有中国社会内部的民间基础的,而这一点却因为我们对自身历史传统的陌生而多少被湮没了。在作者看来,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首先是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发现中国历史,即去发掘民众生活变化对于近代社会转型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民众生活世界所蕴藏的中华文明潜在的生命力和再生力,以及其对中华民族生存延续与民族复兴所起的作用。

(作者系青年学者)



打开光明日报客户端,扫描二维码,浏览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王振芬 孟宪实 荣新江主编 中华书局